

“仁”字的起源

□ 谢阳举

弄明白“仁”的古义才能进一步认识“仁”的思想内涵及其演变。据清代学者阮元考证，在先秦古籍中没有出现“仁”的本字，周初虽然有类似“仁”的说法，但并没有“仁”这个字，到西周礼乐文明兴盛之后才创造出了“仁”字。据郭沫若考证，“仁”是春秋时代出现的“新”名词，在春秋以前的古书里面找不出这个字，在金文和甲骨文里也找不出这个字。这两位大家说的可不只是古文字学的问题，更是“仁”的思想史的大问题。

《说文解字》里收录了“仁”这个哲学字，还给出了三种字形和解释。第一种“亲也，从人二”，说的是春秋以后“仁者爱人”那种“仁”；第二种“古文仁从干心作”，代表后来人们认为“仁”是人应有的道德心性；第三种“古文仁或从尸”，相当于自然心性的“仁”。许慎也不确定哪个是本字，不过我们要弄清楚“仁”的起源，就得回答最古老的是哪个。第一种“仁”字出现得晚，第二、三种古文更古老，尤其是“从尸”的“尸”字，是从社会史探寻“仁”起源的关键。“仁”怎么会来源于看似毫不相干的“尸”呢？这要从远古中国的丧祭礼人类学说起。

关于夏商周，有“五礼”和“六礼”的说法，不管哪种，都包含丧、祭这两种礼仪，古代丧礼要求孝子对死者如同生前一样。埋葬前设祖奠饯行，除了献酒，还设木制的“重”，丧礼结束进入祭祀阶段，就不用再制主牌，改用“尸”。这很关键，最早的“仁”就源于此。“尸”是让死者后代，如长孙或同姓晚辈装扮成祖先享祭，简单地说，“尸”可以解释为“替身演员”，丧祭礼就是“纪念仪式”。这种古礼寄托了古人的心理假想，也是“仁”起源的标志，从夏朝就有，《诗经》里也有例子。

祭祀时，人们对祖先的虔诚、

敬重等感情，集中在“尸”上，这标志着“仁”这种内在行为的原始面貌，体现出对鬼神“尽心”的心性表达。这方面证据很多：甲骨文和金文里“尸”字形有特点且一脉相承，殷人还把站立的“尸”改成坐着的，这和古代屈肢葬有关。从甲骨文看，《说文解字》里“从人二”和“从尸”的“仁”字不同，“从尸”更早，所以“仁”起源和尸祭礼有内在关系。郭店楚墓竹简能佐证，“从人二”的“仁”是后来衍生的。“仁”起源于“事死如事生”，是对祖先灵魂的虔诚敬拜，孔子、孟子的话也呈现了“仁”字的本源性。

说白了，“仁”源于“事死如事生”这种对祖先灵魂尽哀尽敬的礼仪，“仁”本来是对祖先灵魂的礼仪极端虔诚和敬拜的自然心性，要求像死人还活在眼前一样地怜爱和敬祀他（她）。孔子说“祭神如神在”，就体现了这种“仁”的本源性。战场上每杀死一个人就掩上他的眼睛，这杀人之中也有“仁”，指的也是这种本源的“仁”。孟子说的“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指的是本源的“仁”。

远古的东夷人可能是尸祭礼的发明者，也是最早完善丧祭礼仪的族群，他们的尸祭礼传播最广、影响最大，较早倡导“仁”的观念。传说“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就与这种文化人类学习俗有内在关系。

东夷人与“仁”的关系在《庄子》里可以找到依据。《庄子》这本书里经常攻击仁义，追溯仁义起源的时候说：“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撝人之心，尧舜于是乎股无胈，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自虞氏招仁义以挠天下也……”这里说黄帝、虞氏、尧等发明并鼓吹“仁”，可能是基于这几个部族较早倡导“仁”的历史。这种说法在先秦诸子的著作里也不少见。而虞氏指的是舜，

根据《孟子》的记载，舜是“东夷之人”，因此可以判断东夷的风俗尤其崇尚“仁”，在黄帝、尧等众多部族中较早完善了尸礼制度。这里有一个考古学的佐证，就是新石器中晚期以来，各地区发掘出大量墓葬和民族公共墓地，这说明中国各古老民族从远古就重视丧葬。史书记载夏商西周都设置“尸”是有根据的，部族重视“仁”就和这种丧葬祭祀礼仪相互印证。把“仁”和丧祭礼文化史联系起来，说东夷的风俗是崇尚“仁”的，这种说法是站得住脚的。墓葬风俗的兴起，还有丧祭制度早早地形成并完善，其实就是古代宗法社会里人们对亲人离世有着不忍之心和“仁”的心理不断发展演变的见证。

老子对“仁”的态度较为复杂，可以说他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对“仁”的。老子自然深知“仁”与丧礼之间的因果关系，但老子失去生与死是一个自然的循环过程，主张顺应自然、无为而治。他认为“大道废，有仁义”，在他看来，“仁”是社会道德衰败、人们失去自然本真状态的产物，“仁”所构建的社会秩序是在社会出现混乱和问题后才产生的补救措施，并非根本的解决之道。

在这一点上，孔子的态度则截然不同。孔子出生在东夷文化与华夏文化相互交融的地区。由于“仁”源自丧祭礼仪，因此孔子及其弟子极为看重丧礼和祭祀，将其视为“仁”的源头。孔子虽讲“未知生，焉知死”，却也主张“事鬼敬神”。他深知，丧祭礼仪若被废弃，人们的不忍之心、“仁”的思想感情都会消逝，人伦道德也将失去根基，“仁”爱的教义便无所依托。

所以，孔子十分重视丧祭礼仪，期望借此培育“仁”心。据《礼记·檀弓》记载，孔子两次在卫国时都专门研究过丧礼。现存《礼记》多为孔子七十多位弟子及后代所记，大半内容讨论丧礼。从丧服

五制了解宗法制度体系，这体现了儒家“寓教于礼”的追求，即通过礼仪明白道理、蕴含教化。可见，儒家重丧礼传统浓厚，“仁”学建立在丧祭礼学之上，依赖丧祭礼才能发展，没了古礼，“仁”就成了无源之水。

在儒家眼中，丧祭礼绝不可废，它是体现“仁”、教导“仁”、实现“孝”和明白人道的依据。《论语》中孟懿子问孝，孔子答“无违”，即生时依礼侍奉，死后依礼埋葬、祭祀。孟子也提到守丧三年等礼义三代皆同，强调了礼仪是根本，结合“仁”与尸礼关系，“仁”的基本意义也就明晰了。

到了墨家那里，则对“仁”的态度又有变化。和老子一样，墨家明确反对那种过于重视丧礼、厚葬致贫，反对活着的人为死者过度悲伤。墨子干脆抛开了“仁”原本和丧礼的联系，但保留了后来衍生出的“爱人”这方面的意蕴，也就是“兼爱”的“仁”，主张无差别地爱所有人。这个时候，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仁”，一种以同情、友爱为核心的道德观念就正式出现了。

“仁”的起源揭示了中国思想史中礼制与心性的互动：尸祭礼通过仪式将哀敬之情对象化，催生出内在的心性之仁；儒家以此为基础，将其扩展为伦理化的“爱人”原则。这一过程不仅厘清了“仁”的本源与衍变次序，也为理解儒家重丧传统、孝仁关系及儒、道、墨的分歧提供了关键线索。唯有回归礼制与字源，方能穿透后世诠释的迷雾，直面“仁”的原始意蕴。

（作者系西北大学教授、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所长）



《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中的“学”与“仕”

□ 李 毅

陆九渊《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名篇。该文为陆九渊受朱熹邀请，至白鹿洞书院演讲后留下的文字记录。文中围绕《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指出官员不应计较个人功名利禄，而应以家国天下为怀；学者不应计较考场得失，而应致力于阐明道义。全篇言辞恳切、感情真挚、行文流畅、语言优美，至今仍然具有较强的参考意义。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陆九渊则是心学的奠基人，二人生活在同一时代，但学术思想大相径庭。南宋淳熙二年（1175年），二人曾在鹅湖寺聚首。由于理念上的巨大分歧，这场著名的“鹅湖之会”以双方的不欢而散告终。但二人都是追求真理、胸怀宽广的人，一直在寻找求同存异、再次切磋的机会。

淳熙六年（1179年），朱熹任南康知军。上任不久，朱熹便找到庐山脚下曾经盛极一时但当时荒废已久的白鹿洞书院，多方筹资重建校舍。淳熙八年（1181年），白鹿洞书院刚刚复兴，朱熹便邀请陆九渊前来会讲，陆九渊也慨然应允。这次相见的气氛非常融洽。两人一起畅游庐山名胜，途中朱熹感叹：“有字宙以来，已有此溪山，还有此佳客否？”将陆九渊引为知己。在朱熹的极力主张下，陆九渊在书院登坛开讲，最终留下了《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这一千古名篇。

在讲演的开头，陆九渊引用了《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随即提醒学者们要“切己观省”，以便充分吸收此章的营养。陆九渊此言针对的是汉唐以来颇为盛行、在宋代仍有影响的经传注疏之学。这种学问主要将包括

《论语》在内的经典作为解释的对象，甚至仅仅作为展示自己渊博知识的舞台。据说汉代的一些儒者解释经典中的几个字，就能通过旁征博引达到万字以上的篇幅。这些明显过多的解释不仅对解释者的身心毫无益处，而且在经典和后人之间设置了巨大障碍，使得很多后学穷其一生都被困在大量的解释文字之中，失去了直面经典的机会。陆九渊强调《论语》此章“辞旨晓白”，就是提醒学者不必画蛇添足，过多解释；在此基础上强调“切己观省”，则是希望学者能够“讲之以身心”而不仅“讲之以口耳”，将经典和自己的人生真实地联系起来。

紧接着，陆九渊指出，《论语》此章与其说是“义利之辨”，不如说是“志向之辨”；与其说是让人进行客观方面“义”“利”之间的取舍，不如说是让学者进行主观方面“志乎义”“志乎利”的辨析。在儒家看来，客观方面的“义”“利”并不一定冲突。“义”代表事物之所宜，“利”则代表事物得其所宜而获得最终的成就，因此《易·文言》有“利者义之和”的说法，将“利”定位为“义”的果实。在客观方面，“义”“利”往往是可以兼得的，“义”是根本，“利”是枝叶，本末一贯。但在主观方面，就存在用心于根本和用心于枝叶的对立，亦即“务本”和“逐末”的对立。“务本”则不必揠苗助长而苗自壮，“逐末”则根本萎缩而末也终不可得。“志乎义”就是“务本”，“志乎利”则是逐末。“志乎义”则利益自然生成，“志乎利”则虽得小利却隐藏大害。应当说，陆九渊这一解释使得此章呈现出更高的合理性。

随后，陆九渊指出此章中的“喻”字不是“知晓”的意思，而是

“洞察入微”的意思。在陆九渊看来，君子并不是“不知道”利，也不仅仅是“知道”义。君子对于道义洞察入微，对于利益则知其大者。相应地，小人不是“不知道”义，也不仅仅是“知道”利。小人对于利益锱铢必较，对于道义则浮皮潦草。陆九渊认为，君子小人之间之所以有这样的区别，正是因为前者“志乎义”，后者“志乎利”。“志乎义”，则每天所思所想都是在琢磨道义，所以对于道义洞察入微；“志乎利”，则每天所思所想都是在进行利益算计，所以容易因为蝇头小利而违背道义。“志乎义”而于道义洞察入微，所以能够“兼济天下”，“志乎利”而陷入小利之中，则往往“见小利则大事不成”。陆九渊的这一解读是非常深刻的。

在简要阐明《论语》此章的大旨之后，陆九渊结合当时与学者密切相关科举制度，进一步帮助学者们“切己观省”。陆九渊认为，科举未必能检验出真才实学，在其中获得的分数和名次带有较大的偶然性，“非所以为君子小人之辨也”。陆九渊指出，人们以科举名次的高低来判定人品学识的高低，使得学者们沉溺其中而不能自拔，往往忽略甚至违背了孔子“喻于义”的告诫。受此风气影响，在科举考试中胜出、顺利走上仕途的人，心里每天盘算的，往往只是自己官位的高低、俸禄的多少，这样的人，哪里能够指望他在家国事务和民生疾苦上尽心尽力，以无负于国家和人民呢？

基于这种情况，陆九渊倡导学者们进一步“切己观省”，认真地想一想：我怎么能让自己成为喻于利的小人呢？陆九渊认为，只要意识到这一点，就会对于“利欲之习”痛心疾首，就能将志向坚定地树立

在道义方面，每天专心自修，像《中庸》所说的那样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有了这样的基础，再去参加科举考试，写出的文章就能够陈述平日所学、胸中韬略。有了这样的基础，再去做官，必定能够尽忠职守，“心乎国、心乎民”，丝毫不计较一身之得失、个人之荣辱。陆九渊坦言，这样的学者、这样的考生、这样的官员，才真正称得上君子。

邀请人朱熹对陆九渊所讲大为认可，给出了“愚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学者隐微深痼之病”的赞美，表示“熹当与诸生共守，以无忘陆先生之训”。根据朱陆二人的观察，“听者莫不悚然动心焉”“至有流涕者”。朱熹害怕学者们只是一时感动，过后重又陷入“利欲之习”中，所以请陆九渊将所讲内容写下来，后刻碑立在白鹿洞书院中，成为后世学者们“切己观省”的重要资借。

陆九渊的“切己观省”是我们阅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的重要原则。陆九渊对于“志”的提点和对于“喻”的训解，对于“利欲之习”的批判和对于学者、官员之使命的揭示，有助于人们重新审视《论语》原文乃至传统“义利之辨”的深刻内涵。《白鹿洞书院〈论语〉讲义》背后所体现的摒弃门户、求同存异、百家争鸣、求真求实的优良学风，也是中华文明突出包容性的重要体现。



（上接1版）

厘清监督标尺，把准巡视发现问题的根本方向。巡视的本质是政治监督，发现问题必须聚焦“两个维护”根本任务，首先明确“用什么标尺”“查找什么问题”这个大前提。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监督根本标尺，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被巡视地区和单位的职责使命，重点查找履职尽责特别是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中存在的政治偏差。一方面，去伪存真，善于发现“真问题”。紧盯权力和责任、紧盯“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紧盯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深入查找影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矛盾、落实改革部署中的重大偏差、全面从严治党方面的突出问题，加强对“三重一大”事项监督以及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等重点领域的监督。另一方面，去粗取精，善于发现“大问题”。善于从政治上发现问题、查找政治偏差，消除“七个有之”、政商勾连腐败危害国家政权安全等政治隐患，捍卫政治安全。对“国之大者”、党之大计要了然于胸，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等，深入查找各领域存在的机制性制度性漏洞，推动解决好影响党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的突出问题和潜在隐患。此外，还要见微知著，敏锐发现“新问题”。发挥巡视“前哨”“探头”作用，紧盯“四风”问题新动向、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及群众反映强烈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加强监督，抓早抓小、防患于未然。

优化监督机制，发挥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体制机制优势。综合监督是巡视工作的突出特点和显著优势，必须以系统集成推动各类监督贯通协调。充分彰显巡视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以贯彻落实新修订的巡视工作条例为契机，进一步坚持和加强党对巡视工作的全面领导，有力发挥党委（党组）、巡视工作领导小组等作用，强化政治巡视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有效发挥各类监督协调机制作用。加强巡视与纪检监察、派驻、组织、审计等各类监督贯通协调、有效对接，推动政策、人员、机制和监督成果立体聚焦、形成合力。作为派驻纪检监察机构，要推动建立健全中央单位内部巡视与纪检监察监督贯通协调机制，不断完善信息沟通、线索移交、协同监督、成果共享等工作机制，构建同向发力、相互促进的工作格局。充分激发被巡视党组织主动查摆问题的内生动力。作为巡视组，要突出思想政治引领，推动被巡视党组织尤其是“一把手”主动思考本单位根本性、长远性、战略性、全局性问题，本着对党负责、对事业负责的政治态度与巡视组同题共答，找准找实主要差距和不足。同时，鼓励广大干部群众积极主动反映问题。充分压实巡视组深入发现问题的政治责任。增强巡视组使命意识和“两职”观念，系统强化教育培训和多岗位实战练兵，增强斗争本领。特别要充分发挥巡视组各层级、各专业、各领域干部优势，调动年轻干部以及纪检、审计、信访等专业干部积极性，提高突破问题的敏锐性和战斗力。

丰富监督“工具箱”，打好巡视发现问题的“组合拳”。一是创新组织形式、优化巡视方式。科学统筹常规巡视、专项巡视、机动巡视和巡视“回头看”，灵活开展提级巡视；加强上下联动，与被巡视单位内部巡视、审计有机结合，以下看上发现问题。二是打破常规套路。充分用好巡视工作方案，突出个性化特点，围绕“四个落实”细化监督重点、梳理问题清单，避免千篇一律。穿插运用个别谈话、听取汇报、下沉调研、专题座谈、调阅资料等方法，因时因事因地制宜，瞄准重点、快速精准发现问题。三是加力推进立行立改和边巡边改。把深入了解问题线索摆在更加突出位置，集中精干力量成立专班，强化线索分析、询问知情人、抽查核实，推动边巡边查真落地、见实效，不断凸显巡视利剑的震慑作用。选准问题推动立行立改，及时回应群众关切。四是树立大数据思维。大数据信息化赋能是时代所需、形势所需、任务所需。探索建好用好巡视监督数据库、重点领域大数据分析模型、数据分析工具等，拓宽发现问题渠道，增强监督穿透力，让隐形变异“四风”和新型腐败问题无所遁形。

拓展实战“方法库”，提升巡视发现问题质效。从宏观层面把准思想方法。注重运用科学的思想方法指导巡视监督工作，坚持用历史的、发展的、联系的、辩证的观点分析问题，准确把握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实事求是，以事实为依据、以纪法为准绳，精准发现问题、如实客观反映问题，既不夸大也不缩小。从中观层面优化思维方式。善于从业务看政治、从现象看本

质，善于透过问题看责任、从客观看主观，善于同题共答、落实共同政治责任，善于围绕权力配置与运行、聚焦“关键少数”强化监督。强化法治思维和程序意识，严格落实“不干预被巡视地区（单位）的正常工作，不履行执纪审查的职责”要求，把依规依纪依法作为一条红线贯穿始终。从微观层面用活工作方法。总结好运用好实践中行之有效的方法，如典型案例剖析法、数据论证法、趋势研判法、工作闭环法、上下联动法、内外互动法、归纳演绎法、多角度印证法、成效倒推法、硬伤排查法等，找准发现问题的切入口和突破口，提高发现问题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强化审核把关机制，增强巡视报告问题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探索建立巡视报告审核机制，是四次全会部署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深刻认识加强巡视发现问题审核把关的极端重要性，研究明确审核范畴、审核标准、审核主体和工作机制，有效发挥领导小组审议、组办会商、与被巡视单位主要负责人沟通等制度作用，压实巡视组审核责任，分类分类加强巡视报告审核把关。同时要完善负面清单制度，对巡视发现问题中事实依据不清、政策支撑不足、超出职责权限的予以排除，确保巡视成果经得起历史和实践的检验。

坚持政治引领、强化责任担当,把巡视整改成果转化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贯落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四次全会部署要求，把督促校准政治方向、站稳人民立场摆在突出位置，紧盯整改责任落实和重点领域整改，推进巡视整改见真章、求实效，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

以强化政治引领促整改，督促校准政治方向。无论是巡视期间还是整改期间，加强政治引领都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通过巡视，要及时坚决纠正“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阳奉阴违等，推动被巡视党组织在思想上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本单位改革发展的目标定位和部署要求，确保思想统一、方向一致；在政治上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确保言行一致、令行禁止；在行动上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奋力推进改革攻坚、促进高质量发展。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党和人民的事业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指引的方向前进。

以强化宗旨意识促整改，督促站稳人民立场。巡视整改效果事关民心，必须树牢服务人民、造福人民的价值追求。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巡视整改全过程，人民群众痛恨什么、反对什么，就重点整改什么，持之以恒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从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高度出发，坚决纠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强力解决“数字整改”、纸面整改、虚假整改、边改边犯等问题，严厉惩治贪污侵占、虚报冒领、截留挪用等群众身边的违纪违法问题，保证群众利益不受侵害。完善整改公开机制，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增强群众对整改成效的认同感和获得感，以整改实效凝聚民心。

以压实政治责任促整改，督促形成整改落实闭环。构建覆盖巡视整改全周期的责任体系、分工体系和制度流程，推动主体责任主体协同发力。压实整改主体责任，强化被巡视党组织和“一把手”、班子成员的政治责任，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严肃认真抓好巡视整改。纪检监察机构要压实整改监督责任，加强整改情况督促检查，创新巡视整改日常监督机制，建立健全评估问责机制，对于整改不到位的适时开展督导检查 and 巡视整改“回头看”，精准用好问责利器倒逼整改责任落实。

以破解关键问题促整改，督促解决制约高质量发展的顽瘴痼疾。推动解决巡视发现的长远性、系统性、根本性问题，是决定整改质效的关键所在。坚持分类整改与突出问题集中整治相结合，对于巡视指出的重点人重点事特别是改革攻坚中遇到的难啃的“硬骨头”，督促被巡视党组织特别是“一把手”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整改落实，防止“急于销号”“一销了之”。坚持“当下改”与“长久立”相结合，紧盯问题发生的根源症结、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推进标本兼治，以巡视整改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助力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的“拦路虎”“绊脚石”，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清障护航。

（作者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水利部纪检监察组组长、水利部党组成员）